

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与中国共产党 上海早期组织创建

孙珊 曹景文¹

【摘要】：从社会史视角考量，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集中表现为“主义”崛起、“社团”兴起、“阶级”奋起和“革命”涌起并呈现激进化的演进态势，与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建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主义”的崛起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建准备思想条件，“社团”的兴起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建提供组织支撑，“阶级”的奋起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建激发民众意识，“革命”的涌起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建营造政治氛围等。换言之，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的演进与激进化态势及其话语体系的诸多层面，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建提供了重要条件和准备。

【关键词】：共产党早期组织 社会改造思潮 五四时期

【中图分类号】 K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18X (2021) 04-0159-09

社会思潮是社会变迁的思想文化反映与理论表征，乃是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社会改造”思潮缘起于动荡、转折与交替并存的五四时期，在世界“社会改造”潮流兴起以及满足中国社会需要背景下产生，是以批判旧社会、改造新社会为目标指向的进步思潮，具有多元性、流传性和复杂性等显著特征。五四时期，中国处于此起彼伏的“社会改造”思潮之中，随之而起的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人对社会改造的认知与实践，使中国迎来了“社会改造”时代。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初雏形，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建始于“社会思潮”语境所形成的话语背景，其与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的关系需要在学理层面予以深入系统的研究。当前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成立过程的历时性叙事及其历史作用的阐释，而从社会史意义上对其诞生的历史缘由进行深层探究，尤其是探讨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与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研究则较为罕见。

本文试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视角，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方法分析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与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建的关系，从五四时期包括“主义”“社团”“阶级”“革命”等在内的“社会改造”思潮话语，对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建所需要的“思想条件”“组织支撑”“民众意识”“政治氛围”等层面的影响进行历史梳理和逻辑审视，以期为理解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建的历史必然性提供新的认知，并以此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一、“主义”崛起：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建准备思想条件

五四时期是“社会改造”的时代，亦是“主义”崛起的时代，具体表征为先进知识分子关于“主义”的认知解读与“社会改造”话语联系甚为紧密。20 世纪初叶的上海，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种种“新思想”“新主义”“新学说”陆续登场。

作者简介：孙珊，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上海 200241）
曹景文，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241）

无论是主张劳资调和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还是强调个人绝对自由、主张取消私有制、废除国家的无政府主义，抑或是平民合作主义等形形色色的主义派别，皆以满足“社会改造”需求为旨归而成为传入国内并在上海传播的“新思潮”，成就了“主义”盛行的时代，客观上营造了有利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思想文化氛围，深刻影响着广大先进知识分子和众多民众的思想走向。

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得以在上海创建，究其实质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率先在上海的传播、流行和扎根。换言之，作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崛起，与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历程密切相关，同时也是“主义”时代，各种“主义”相互竞争、论战、交锋、衍化的必然结果。五四时期“社会改造”话语环境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为“主义”的论争与抉择生成了适宜的土壤，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诞生提供了准备与可能。

五四时期“社会改造”语境中的“主义”话语自然是与马克思主义传播以及十月革命的影响联系在一起。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入上海后，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逐渐将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对欧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失望转向俄国社会主义期待，救国救民思路由“效法西方”转向“以俄为师”，开始用马克思主义学说重新考虑中国“社会改造”问题，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思想界的流行。

十月革命胜利后一段时间，西方媒体垄断了苏俄信息，妖魔化地视十月革命为“洪水猛兽”“过激主义”，从当时宣传情况来看，存在信息紊乱、不实等状况，时人戴季陶曾说：“俄国的事，报纸上的记载，各持一说，究竟是怎么一个情形，几乎使我们看报的人堕在五里雾中。”^[1]而当时以《民国日报》为代表的上海多家报刊对俄国十月革命持赞扬和同情的态度，积极予以关注报道，且随着俄国革命局势稳定，舆论报道内容渐趋明晰。譬如，《民国日报》以“突如其来之俄国之政变”“俄国大政变之情形”“俄国大政变之混乱”“俄国大局之混乱”等标题连续刊登十月革命盛况，成为上海报道十月革命的先行报刊。

《民国日报》刊载的《劳农政府治下之俄国——实行社会共产主义之俄国真相》^{[2] (P85)}一文，赞赏十月革命并揭示其本质，介绍苏维埃政府各项政策措施，呼吁中国舆论界客观公正地看待俄国劳农政府，而“不宜学英美资本家的口吻，去谩骂他们”，更“不宜学官僚军阀的脑筋，去仇视他们”，而是要“细心去考究”，然后“才可以下一个公正的批评”，在引导思想界及广大民众客观理性地认识和理解苏俄革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上海的《申报》《太平洋》《东方杂志》等报刊亦对俄国十月革命予以不同程度的关注与宣传，增进了民众对社会主义的认知与好感。譬如，《申报》刊登了伦敦有关十月革命电短讯，以及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消息。《时报》从1917年11月13日起，开辟了“俄国革命消息”专栏，刊载俄国革命动态，包括苏维埃政府的内外政策等内容。

《太平洋》杂志于1917年11月15日在《革命后之俄罗斯政变》一文中，认为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乃是俄国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即“俄民以处于极端贵族专制政体之下，阶级嫉视之观念已深”^[3]。1918年3月，《东方杂志》在第15卷第3号刊登《述俄国过激派领袖列宁》一文，成为上海及国内介绍列宁生平事迹的开山之作，刊登列宁照片并介绍列宁生平和事迹，宣传其在革命胜利之后组建“劳农政府”，进而陆续公布各项革命措施，肯定了列宁在俄国革命运动中的作用。

随着一批文章的刊载以及书籍的出版，如《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于1919年7月刊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了张冥飞辑译的《劳农政府与中国》，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李绰翻译的《俄国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李达编译的《劳农俄国研究》和瞿秋白撰写的《新俄国游记》等，切实帮助国内民众了解更为真实的苏俄并产生对苏俄革命的向往之情。

1922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俄共早期政治家托洛茨基著的《俄国革命纪实》，对十月革命从酝酿到成功的过程进行了细致叙述，帮助中国读者了解苏俄革命的真实情况，加深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进一步坚定了“走俄国人的路”的信念。概言之，俄国十月革命对上海产生了深刻影响，推动了上海思想界对苏俄革命建设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营造了激进的思想

想氛围并树立了苏俄革命实践榜样，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创立奠定思想基础和民众心理基础。

“主义”在五四时期“社会改造”话语中崛起，而五四运动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骨干成员陈望道在谈及五四运动时说道：“对一切五四以后以‘新’为名的新什么新什么的刊物或主张，不久就有了更高的判别的准绳，也就有了更精的辨别，不再混称为新、混称为旧了。这更高的判别的准绳，便是马克思主义。有了马克思主义，便有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4] (P284)}

无独有偶，陈独秀明确表达了对政治的态度，1919年他在《新青年》发表的宣言中强调其所主张的民众运动和社会改造应与各派政党断绝关系，认为“承认政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而且相信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就是有限制也是拿着有无职业作标准，不拿有无财产作标准”^[5]。由此看出，虽此时《新青年》仍在坚持民主主义，但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等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已反映出社会主义倾向。

1920年5月1日《新青年》“劳动节纪念”专号的出版，成为其向社会主义刊物方向发展的重要标志，为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埋下了伏笔。创刊于1919年6月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大篇幅登载讨论社会主义、社会改造问题、劳动问题的译文，对读者了解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大有裨益。上海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与《觉悟》编辑联系密切，逐渐将《觉悟》转变成宣传马克思主义又一重要阵地，认为应当“走社会主义道路，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社会改造的指导思想，知识分子应到劳动人民群众中去”^{[6] (P188)}。

对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热衷，当时国民党人概莫能外。譬如，国民党指导创办的《星期评论》发布一批有关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方面的文章，而同为国民党创办的《建设》则刊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唯物史观等方面译文和文章，“刊载各类文章111余篇，其中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有33篇，约占文章总数的30%”^{[7] (P346)}。即便《星期评论》主要是从预防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出发来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和劳动问题，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依然为马克思主义在上海传播做出积极贡献。

除此之外，研究系¹主办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亦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主张的同时，刊载了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河上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文章，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瞿秋白所言，“几乎所有同新文化有联系的杂志都刊登文章宣传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以及基尔特社会主义”^{[8] (P289-290)}。总之，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内容在上海地区的宣传，有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崛起，尤其推动思想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产生新的飞跃，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要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是近代以来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符合上海工人运动发展需要以及民众心理需求。五四时期的上海，接受新思潮、新思想的进步青年怀揣改造社会的愿景，遭受多重压迫的工人阶级对改变自身处境的强烈呼唤，马克思主义“批判”“改造”“革命”性特征及其在苏俄的成功实践等多重因素，使得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运动或革命成为上海先进分子和进步民众的普遍诉求，即他们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效仿俄国，通过革命的手段获取民族和人民的解放。因此，“主义”亦即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成立准备了思想条件。

二、“社团”兴起：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建提供组织支撑

社团的兴起作为五四运动后中国社会现象中独特的景观，根源于早期新文化运动宣扬“个人解放”而“走出家庭”的成果，同时与青年人在五四运动中走向社会进行“直接行动”以及开展“社会改造”实践活动密切相连，在事实上推动着社会思潮由“个人解放”进至“社会改造”阶段话语的转变。五四时期“社会改造”语境从思想进至行动，必然要求建立相关的社团组织，以引领先进分子实际地走上激进化道路并从事改造社会活动。尽管此时社团组织并非政党，但为向政党的转变创造了一定的组织条件。究其实质，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乃是政党的雏形。只有有了主张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阶层，以及组织无产阶级政党

的领导群体，共产党早期组织才具备诞生之可能。

就上海而言，社团及所办期刊的兴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进步民众的思想启蒙发挥了重要作用，社团创办者及其期刊撰稿人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重要传播主体，引领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培育发起人和领导群体创造了条件。如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早期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发挥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前身。可以说，上海的社团组织兴起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成立提供了有力的组织支撑。

团体组织意识及集体主义意识在五四运动后有了普遍增长，不仅先进知识分子有着创建思想性、学术性团体的强烈愿望，而且知识分子将创建团体意识比较自觉地向普通工人进行传输，以期工人能够提升对组织团体和联合力量的认知。进而，组织社团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与五四运动后政治实践的重要载体，亦成为五四时期的突出现象。近代以来，上海因其特殊地理位置优势，相比于全国其他地区，最早受到西方民主、自由、平等观念冲击，这使得上海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市民社会雏形，而市民社会则成为社团组织培育的沃土，具有上海特色的会馆公所、经济社团、政治社团、文化社团、群众社团、公益社团等社会组织发展尤快，上海也因此成为近代中国主要政治组织诞生和活动的舞台。五四时期的上海，林林总总的社团因“主义”的不同而分化，而这其中不少进步社团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努力将思想启蒙与政治实践相结合，凝聚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进步青年和工人大众，培育并形成一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立准备了干部条件和领导群体，提供了成立政党组织不可或缺的要素。

在“劳工神圣”思潮影响下，各类行业工会组织和宣扬工读互助、合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的社团在上海竞相成立。然而，工会或社团一开始却被少数政客所掌握，此种现象在产业工人集聚的上海尤为显见。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指出，“象上海的工人团体，就再结一万个也都是不行的。新的工会一大半是下流政客在那里出风头，旧的公会公所一大半是店东工头在那里包办”，因此他号召“觉悟的工人呵！赶快自己另外联合起来，组织真正的工人团体呵”。^[9]在陈独秀看来，提高工人组织团体的意识，关键就在于工人具有自身的阶级觉悟和阶级认同感，并进而具备联合的思想。五四之后，上海的工会组织密集性出现，上海工读互助团、上海女子工读互助团、平民周刊社、沪滨工读互助团、沪滨伙友工读互助团、上海织袜女工工会、药业友谊联合会等组织日渐成为具有独立斗争力量的社会组织。其中陈独秀发起创办的新青年社及《新青年》杂志为最具有代表性的社团组织，其编辑及撰稿人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等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领军人物，在思想界产生很大影响，日后《新青年》还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理论刊物。1920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上海以“新青年社”为中心，就社会主义和社会改造问题举办座谈会，邀请戴季陶、沈玄庐、张东荪、邵力子等诸多期刊撰稿人参加，与会代表中的诸多人物成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骨干力量。

社会改造需要社团发挥作用，而进步期刊作为社团活动的重要舆论阵地，其主要撰稿人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灌输和洗礼，率先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发起人及领导群体的培育和产生创造了条件。历经五四运动的政治实践洗礼，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上海工人运动之“理论—实践”双重感召下，先进分子从工人阶级身上看到了巨大的革命力量，日渐汇聚成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宣传的知识分子群体。譬如，陈独秀在上海工界、学界、文化界开展了一系列活动，调研工人阶级状况，积极开展革命宣传组织工作，发表了《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劳动者底觉悟》等文章，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谈政治》一文，更是成为陈独秀从民主主义者彻底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留学生在日本接触学习马克思主义后陆续回到上海，创办编辑刊物，译介有关马克思主义文章，并成为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介工作者。同时，大批读者在期刊的影响下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认同者和拥护者，进而成为革命的追随者。

三、“阶级”奋起：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建激发民众意识

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念与阶级斗争理论有着极强的穿透力与实用性，深刻地影响着五四时期思想界的走向，极为重要的表现

在于促进了“阶级”意识的普遍增长。“阶级”在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是一个使用频率较高的话语范畴，不仅马克思主义者较为广泛地使用，在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文本中也有所体现，表征着五四时期思想演进的阶级性特征和激进化色彩。列宁指出：“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10]所有政党都是特定阶级的组织，是特定阶级的代言人及其阶级利益的实现者。一定的阶级基础是政党诞生的必要条件，缺少一定的阶级基础，此阶级的政党则不会出现。前文已提及，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虽不是政党，但已是政党的雏形，初步具有政党组织的一般性特征。因此，考察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创建缘由，就必须研究劳动阶级的觉醒、成长与奋起历程，尤其需要从上海工人阶级如何以独立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中探析深层次原因。一般认为，政党兴起是阶级力量意志的表现，正是上海工人等劳苦大众“阶级”意识的奋起，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建提供了民众基础。

从“社会改造”思潮语境来看，五四时期“阶级”意识的增长，自然表征为对自身所属的阶级阵营及社会阶级状况的认知。上海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率先作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基于社会改造的认知逐渐摆脱传统士大夫的精英意识并服从于社会改造需要将自身置于民众之中，凸显和注重民众“劳动阶级”地位。譬如，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领导人陈独秀以阶级观念来诠释“劳动者”，并提出了“劳动阶级”范畴。他认为：“就职业上说，是把那没有财产的木匠、泥水匠、漆匠、铁工、车夫、水夫、成衣、理发匠、邮差、印刷排字工、佣工、听差、店铺的伙计、铁路上的茶房、小工、搬运工，合成一个无产的劳动阶级。”^{[11] (P38)}在提出“劳动阶级”范畴基础上，他继而阐明“劳动阶级”的历史使命，认为18世纪是“新兴财产工商阶级”时代，而20世纪是“新兴无产劳动阶级”时代。在《谈政治》中，陈独秀基于“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对立问题，提出了“劳动阶级”进行社会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历史任务，认为不仅要在社会改造中重视“劳动阶级”的存在及地位，而且要力争建立“劳动阶级的国家”^{[12] (P49)}。此外，他在上海《伙友》杂志“发刊词”中明确提出被雇佣的月薪劳动者都属于劳动阶级，认为商店伙友、工厂矿山劳动者及交通劳动者是阶级战争的“三大军团”^[13]。“三大军团”主张的提出，亦是工人阶级自身的团结意识和组织意识的突出体现，成为工人“劳动阶级”意识增长的显著表征。

五四时期，上海先进知识分子尤其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充分认识到工人阶级蕴藏的革命力量，主动深入工人中宣扬劳工神圣思想，在社团组织中重视民众理念，依托创办工人夜校、平民学校，指导工会活动等途径提升民众的“劳动阶级”意识，并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所需阶级基础凝聚民众力量。1920年4月，陈独秀与李汉俊、沈玄庐等人深入到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工人开展阶级斗争思想启蒙工作。陈独秀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发表专题演讲，他说：“若是没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要求“做工的人自己起来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强调劳动运动分两步走并将由工人阶级担任统治阶级。^[14]依此可知，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思想认识的飞跃及其立场与世界观的转变，已逐渐认识到工人阶级中潜藏的巨大力量。在陈独秀主持下，《新青年》第7卷第6号设置“劳动纪念号”，关注劳工问题，邀请蔡元培为之提名“劳工神圣”，发表李大钊的《五一劳动史》，介绍“五一”国际劳动节由来及欧美国家工人开展“五一”活动状况，鼓舞劳苦大众激发斗志；发表陈独秀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学说阐述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根源，通俗解释了唯物史观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向工人大众传播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激发工人阶级革命觉悟。《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星期评论》均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与《新青年》相呼应，形成理论宣传的合力。在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指导下，上海工人第一次组织纪念“五一”劳动节活动，成为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发端，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成立激发了民众意识、凝聚了民众力量。

马克思指出：“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15]随着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在上海的广泛传播及其影响的日益增长，阶级的观念日渐注入“民众”范畴之中，使民众具有“劳动阶级”的政治意义，并赋予认同其担负“社会改造”的重要职责。五四期间处于“社会改造”语境下的上海工人，在思想深处受到阶级观念及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其“劳动阶级”意识呈现增长态势。集中程度高、革命性强的上海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发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政治大罢工，率先发挥革命主力军作用，以独立姿态登上革命舞台，成为“劳动阶级”意识彰显的重要体现，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成立所需的阶级基础创造了重要条件。上海的中华工党于1919年6月8日发表宣言：“吾国民受强权之压制，今日已达极点，外人夺我土地，政府卖我人民，倒行逆施，公理何在！……吾辈主张工人自动，各行工人组织各种小工团，然后联合成大工团。

第一步举行工人游行示威运动，第二步举行工界大罢工，第三步牺牲吾辈数十万工人的赤血，与野蛮的强权战。”^{[16] (P99)}充分表明上海工人“劳动阶级”意识觉醒与增长态势，他们将摆脱资产阶级束缚，依靠自己的意志与力量取得民族解放。上海“三罢”斗争推动本以北京少数知识分子为中心的运动发展成为以上海为中心，包括工人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市民群众共同参与的全国性革命运动，有力推动全国五四运动的发展，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以及“劳动阶级”意识在“社会改造”思潮语境中的增长，上海工人阶级开始摆脱固有的依附性和自发软弱状态，进一步认清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本质，联合斗争的意识日益增强，对统一斗争以及统一思想的武器更为迫切，为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集聚受众群体和斗争力量，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立所需要的阶级基础准备了民众力量。

四、“革命”涌起：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建营造政治氛围

五四时期“社会改造”话语走向激进化，先进分子提出以“革命”手段推进社会根本性改造，由此带来了“革命”话语的涌起和盛行。与此同时，“主义”崛起、“社团”兴起以及“阶级”奋起为“革命”涌起铺设了前提并奠定了基础。五花八门的“主义”风靡一时后纷纷解体，使民众意识到点滴的改良不能从根本上改造社会，取而代之的是“革命”话语视域下根本性改造成为新的路径选择，恰如施存统在参加工读互助团失败之后所获真知：“改造社会需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改造是不中用的。”^{[17] (P643)}诚若列宁所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18]

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以及上海工人运动蓬勃开展，推动了“革命”话语在上海的流行。李大钊于十月革命后积极撰写文章称颂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第一人。他在解释布尔什维主义概念时充斥着“革命”话语并强调了“革命”对于社会改造的重要性：“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为宗旨的。”^{[19] (P23)}无独有偶，孙中山于1919年10月在上海青年会发表演说时强调革命是改造中国的第一步骤，认为在不挖掉“地底的陈土”即官僚、武人、政客的情况下，“要想从教育、实业与地方自治着手改造中国，是不可能的”。^{[20] (P13)}一度对社会主义抱有好感，后来参加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建的戴季陶在《新年告商界诸君》的讲演中描述了革命的趋势：“谋公众的幸福，就是图自己的安全。倘若不然，社会革命的大洪水，恐怕不只是泛滥在工业先进国呢！”^{[21] (P422)}此外，十月革命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对上海思想界“革命”话语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如《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表征了初步社会主义倾向，认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否定了少数所谓“先觉者”脱离群众式的革命方式；如老同盟会会员认为“夫革命事业，固国民公众之事业，而非吾党一部分人之事业”^[22]。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创办的《南洋》杂志于1919年发表《社会改革与劳工酬报》一文，认为“自马克思社会主义盛倡以来，全球几为煽动，人人心中皆有改革思想，视旧社会若恶魔罪藪焉”^[23]。戴传贤《革命！何故？为何？——复康君白情的信》中提及：“这几年来，社会上对于‘革命’的恐怖，一天深一天，对于‘革命’和‘革命者’认识上的错感错觉，一天多一天，全世界的进程又正在革命的激流激荡里”，提出了“全人类的普遍的平等的幸福是革命究竟的目的、中国国家和社会的改造是革命现在进行的目的、普遍的新文化运动是革命进行的方法等”，还强调“排除以兵代兵、以官代官那样的‘以暴易暴的伪革命’”。^[24]以上例证均反映了五四时期以“革命”为主题，明达分子深入探讨了有关革命、革命主义者、革命事业等问题，阐明了革命的目的与方法，凸显“革命”话语的频繁出场。诚然，上述“社会改造”思潮语境下有关“革命”的言论，虽不都是出自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但却有力推进“革命”话语在上海的流行，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诞生准备了“革命”的民众心理基础。

“革命”成为五四时期主流话语并逐渐树立话语权势后，促使上海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化，投身苏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宣传及工人运动实践，并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新青年》设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引领和影响更多青年学生用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社会问题。李汉俊在翻译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菊荣的《世界思潮之方向》时，指出在俄国社会革命影响下，世界各国受压迫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觉悟均得以提升，并明确表达了中国需效仿俄国建立共产党的主张。同时表明自身的态度：“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一分子，确实有在中国建立‘革命党’的打算。”^[25]

1919年10月26日，李汉俊在《星期评论》第21号发表《最近上海的罢工风潮》，在概述上海近来罢工事件的同时，提出

应从“精神上打破‘知识阶级’四个字的牢狱，图‘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一致团结”^[26]。《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于1920年1月发表《劳动团体与政党》的评论，呼吁劳动团体应当自己联合起来做大政党。陈独秀于1920年1月底同天津来沪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章志交流，认为社会改造“不能用武，就改用文”，意即开展革命的宣传活来启发教育人民，尤其要面向广大工人阶级，进而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准备力量。参与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筹备的沈雁冰曾发表《俄国人民及苏维埃政府》译文，介绍苏俄革命和无产阶级政权情况。《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在通讯栏就“青年投身到工场去”展开讨论，在青年工人中掀起有关社会改造的讨论。如有青年读者陆续撰文写道：“我们要改造社会，必须要知道社会底实况，要知道社会的实况，必须要钻到社会里去……改造社会，要用急进的激烈的方法，钻进社会里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27]

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社会革命一定要以工场为战场，如果决计要想社会革命，必定要钻进工厂里去”^[28]。故而，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酝酿时期，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调和论”并未得到热烈反响，关乎“革命”的宣传一呼百应。而上海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已逐渐深入工厂与基层，对工厂进步青年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他们初步学会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分析问题，激发他们产生改造中国社会需采取社会革命且要与工人大众相结合这一方式意识。实践证明，上海的“三罢”斗争将五四运动推向高潮，集结了“工人阶级、学生和新兴资产阶级”新阵营，成为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开创并引领了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可见，随着工人运动的深入及早期共产主义者深入工人阶级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革命”话语在上海已逐渐树立话语权势，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成为领导阶级等成为历史的必然。正如学者所言：“五四时期社会革命话语作为‘社会根本解决的方法’而提出来，虽在对其内涵的把握有不同的认知，但最终落实在‘社会主义革命’上。”^[29]

综之，五四时期社会思潮种类繁多、纷繁复杂，而“社会改造”思潮的流行及其成为瞩目焦点，尤其是置身其话语体系下“主义”“社团”“阶级”“革命”等因子的泛起，在推动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思想武器层面有其必然性，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建提供了诸多准备和条件。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建乃是一种政治实践行为，而社会改造思潮在思想引领层面提供了“革命”的话语环境，即在五四运动影响和十月革命榜样示范下，马克思主义从纷繁的“主义”中崛起并最终确立指导地位、“社团”组织在民众动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阶级”力量在上海形成民众基础和根本优势，这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思想引领走向政治实践成为历史的必然。因此，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乃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雏形，其最早在上海诞生自然有着区域社会所提供的特殊条件，但与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联系甚为紧密。新时代，回到历史起点，追溯建党初心，从“社会改造”思潮视角解读和阐释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建历史，不仅可以探索“社会改造”思潮与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之间演进的内在逻辑，而且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建以及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历史必然性的认识。

参考文献:

- [1]戴季陶. 俄国两政府的对华政策[J]. 星期评论, 1919, (15).
- [2]劳农政府治下之俄国——实行社会共产主义之俄国真相[A]. 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 [3]沧海. 革命后之俄罗斯政变[J]. 太平洋, 1917, 1, (8).
- [4]陈望道. 陈望道文集: 第1卷[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 [5]陈独秀. 本志宣言[J]. 新青年, 1919, 7, (1).
- [6]五四时期期刊介绍: 第一集(上册)[M]. 北京: 三联书店, 1978.

-
- [7]田子渝,蔡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史:1918-1922[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2.
- [8]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9]陈独秀.真的工人团体[J].劳动界,1920,(2).
- [10]列宁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 [11]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 [12]陈独秀.谈政治[J].新青年,1920,8,(1).
- [13]陈独秀.发刊词[J].伙友,1920,(1).
- [14]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演说[J].新青年,1920,7,(6).
-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6]中华工党宣言[N].上海新闻报,1919-06-08.
- [17]存统.“工读互助团”的实验和教训[A].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一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 [18]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19]李大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J].新青年,1918,5,(5).
- [20]孙中山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21]戴季陶.新年告商界诸君——在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新年宴会上的讲演[J].星期评论,1920,(32).
- [22]对于新革命党之希望[N].民国日报·觉悟,1919-10-25.
- [23]蔼人.社会改革与劳工酬报[J].南洋周刊,1919,(5).
- [24]戴传贤.革命!何故?为何?——复康君白情的信[J].建设,1919,1,(3).
- [25](日)山川菊荣.世界思潮之方向[N].李汉俊,译.民国日报·觉悟,1920-09-07.
- [26]先进.最近上海的罢工风潮[J].星期评论,1919,(21).
- [27]投向资本家底下的生产机关中去[N].民国日报·觉悟,1920-04-11.
- [28]“钻进工厂里去”的解释[N].民国日报·觉悟,1920-04-16.

[29]吴汉全.五四时期“社会改造”话语与“主义”的崛起——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9,(5).

注释:

1 研究系是以梁启超为首的一个政派,其前身是袁世凯执政时的进步党。成员主要是清末的立宪派分子,一贯执行改良主义政策。五四运动后,这一派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假借社会主义之名来反对社会主义,后发展成张君勱、张东荪为首的反革命的“国家社会党”即“民社党”。